

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 吴飞

【内容摘要】 在这个因为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村”里，在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人类世界的文化景观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果？这个世界是否正变得没有了差异或者更碎片化？现代化、全球化开启了一个单向的线路，人类可以回首自己走出的文化家园，却无法重来。

【关键词】 全球化；现代性；文化杂糅；超文化

1998年，美国迪斯尼公司根据花木兰的故事，投资制作了动画电影《木兰》(Mulan)。笔者第一次看这一动画片正好是在从中国去美国的飞机上，看完片子笔者怅然若失。因为这个动画片对笔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又是如此之陌生。熟悉的是那些场景（如长城、宫殿、古战场、腾飞的巨龙、云雾缭绕的仙山、垂柳、宝塔、中国古代服饰等等）和人物，甚至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陌生的是动画片里应有的中国味：原有故事中的儒家传统价值观、民族矛盾冲突、女性的从属地位等等中国问题，都不见了或者仅隐约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在这里仅仅成为迪斯尼化了的文化产品的故事背景。

迪斯尼在对《木兰》的再生产中注入了该公司的“非凡欢乐、触及心灵”的品牌个性。主角木兰在一连串的理解和吵闹中登场，这是早期迪斯尼打闹喜剧动画常用的噱头；而原著《木兰辞》的开场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做的是传统中国女性的织布工作，是位本分、娴静的传统中国女性，她迫于无奈代父从军，成就了孝道。在迪斯尼的版本中，木兰具有现代迪斯尼女主角的特征：活泼、顽皮、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这样的不安分是不符合中国传统女性标准的，所以在贤妻良母的测试中惨败，以致于木兰对自己产生怀疑。代父从军是木兰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坚定做真实的自我。如此一来，原著中的孝道主题就被迪斯尼改写为女性追寻自我、肯定自我的现代主题，结局自然也烙上了迪斯尼的经典大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对自我的追寻与肯定、自我意志的胜利，以及小人物的成功因其

融入了美国文化产品常见的普世价值而获得西方观众的广泛好评^①，正如美国动画片《花木兰》的华裔角色设计师张振益所言，“以往的女性角色都是弱者，那些等待英雄相救的公主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在这一点上，木兰代父从军的行为与美国女性的反叛精神十分吻合”^②。而中国的故事对西方观众来说，又带着遥远的东方的异文化景观诱惑力。《花木兰》自1998年6月19日起在全美首映的周末三天票房记录就达到2300万美元，仅次于票房收入3100万美元的悬疑科技片《X档案》。它是迪斯尼以往5年所制作的电影中“口碑最佳”的一部。其实，这种文化杂糅的文化产品，不过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已。

一、全球化与文化杂糅

小说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一篇随笔中，对他的小说《撒旦诗篇》被某些穆斯林社会指控为亵渎作了如下辩解：

今天，那些对这部小说叫嚣着极力反对的人大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不同文化的混合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和毁灭他们自己的文化。我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撒旦诗篇》歌颂了杂交性、混杂性、混合，歌颂了人类、文化、观念、政治、电影、歌曲等崭新的和意外结合所带来的转型。小说为杂种化而欢欣鼓舞，对纯洁性的绝对论(absolutism)而恐惧不安。混合物、杂烩、这类和那类东西，正体现了新事物是怎样进入世界的。大量移民所给予世界的正是大大增加了可能性，我一直是试图去表现这一点的。《撒旦诗篇》是

为合成的变化、联合的变化而写。它是献给我们杂种的自我的一首情歌。^③

对此，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评价说，整个“拉什迪事件”——小说本身，由此引发的有关言论自由、亵渎神灵、种族主义、西方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的对立、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等等的争论——当然已经成为了全球现代性文化政治的一个特殊的焦点。^④

首次提出“杂种文化”（hybrid cultures）这一概念的是墨西哥学者凯西亚·堪克里尼（Garcia Canclini）。1989年他在其著作《杂种文化——兼论进入和离开现代性的策略》中，描述拉美国家试图保持文化的纯粹性和自我特征，同时又追求现代性，结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引进启蒙思想实施理性和世俗化时，又造成既非现代，亦非传统，而是本土文化和外域文化杂陈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杂种文化”。“文化杂交性”（cultural hybridity）和“杂种文化”（hybrid culture）由此成为近来文化社会学中的重要分析性范畴。而 Hybridization（“杂种化”）涵盖了多样性、相异性、杂交和宗教融合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它也特别指传统与现代、精英和大众文化的交织。从政治的角度它也应与现代性（化）、社会整合、种族融合、社会不平等这些概念相联系起来理解。从文化杂交论的多元倾向来看，这种思想有助于在当今世界建立多元民主的政治文化，并对抗种族冲突的逆流。^⑤

随着全球化由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学界对文化领域的全球性后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大体而言，学界对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文化后果有以下三种典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使世界进一步整合，种族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步削弱，全球文化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同质化趋势，其中大众文化的美国化就是最可能的后果。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 son）提出了“世界是一个单一的地方”^⑥的概念，乌夫·汗内斯（Ulf Hannerz）也认为现在存在着一个世界文化^⑦。如美国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随着美国自由民主价值在冷战后的胜利，美国文化全球化不可避免，世界大同将由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来实现。^⑧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使各民族共现一个舞台上，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更趋突出，全球化带来文

明冲突的加剧。美国著名学者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就认为，美国文化难以使未来世界实现大同，冷战后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已经让位于对各自所认同的文化的忠诚，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是美国文化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有学者甚至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文化将会呈现出碎片化倾向，各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通过独立来获得身份认同，因此全球化的后果就是更多的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获得更广泛的诉求。

第三种观点就是凯西亚等人提出的文化杂种化现象。这类观点的核心是全球化不会消除各民族文化的差异，这就可以使得各种文化间因为差异而产生冲突，但同时，又会造成文化的杂种化。换言之，全球文化将会呈现一种新的特质。你很容易看到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早餐用的是牛奶加面包，坐着日本生产的汽车上班，听着英国的乡村音乐；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会到新浪微博上看中国发生的事，并偶尔转发或者发帖，他的帖子里不时会跳出一个英文单词；下午喝中国茶；而晚上邀请几位朋友去卡拉OK厅一边喝着德国的啤酒一边唱着流行的韩国歌曲。你说得清楚，这位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文化是什么国家或者民族的传统吗？詹姆斯·鲁尔（James Lull）就认为杂糅是当代文化活动的本质，“文化混杂透过日常例行的传播交换，将现有的文化素材与符码，转换至更为精巧的物质与论述主题及再现，接着将那些形式与其它形式融合建构而成”。他还指出：“混杂不只是每日例行互动产生的文化产物（roduct）；他们是来源（sources）与媒介（media），透过这些来源与媒介，才得以发生此种现象学式的互动”^⑨。

约翰·汤姆林森总结说：“杂交化的概念是描述非领土扩张化进程的一个实质方面的有益的方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混合的普遍现象无疑会逐渐增多，显然需要某些术语来把握它。另外，杂交文化的观念，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把握在‘跨国’文化空间可能出现的某种新型的文化的识别标志——比如在青年文化中所建构起来的、类似于‘hip-hop’的流行音乐的形式”^⑩。

二、克里奥尔化

汉内兹（Hannerz, Ulf）将两种或多种原来离散的传统或文化之间的混合，称之为文化的“克里奥尔化”。他指出：“克里奥尔化的观念……相当贴切地

总结了今日世界上的一类文化过程。这个概念指的是来自不同的历史源头、起初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意义和形式开始在大范围上混杂起来的过程。克里奥尔化在它们纯粹的形式上，自相矛盾地说，是天生不纯的；我指的是民族志事实，肯定不带偏见。克里奥尔化的典型情境是一种社会结构，在那里，一些传统的承担者比其他的更有价值，结果它们各自的传统就这样做了”^⑤。

大阪相爱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戴维·布莱克·威尔斯用“克里奥尔化”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概念工具分析了发生在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克里奥尔”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人通婚后生出的后裔，他们既具有这两个种族的生理特性，又表现出与他们区别开来的新的生物特征。如塞舌尔共和国历史上欧洲人与非洲人结合生下的后裔，南美洲西班牙人与当地印地安人或黑人通婚生下的后裔，他们通常被称为“混血种人”。“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便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比较常见，主要指两种已存在的不同语言在同一地区碰撞的环境中，讲弱势语者去学习强势语时本土语言系统发生的变化。^⑥

戴维·布莱克·威尔斯使用这一概念分析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文化存在怎样的转变问题。在威尔斯看来，“这既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也不是全球同质化和同化的某一其他形式”。他从这个角度分析了日本和美国跨文化交流的“克里奥尔化”过程，由此得出结论：“克里奥尔化现在可以被看作一种深刻的相互文化交流过程，一种空间的社会构建，不仅仅只是殖民化的民族对支配文化的文化适应。人际关系和物质文化（食品、服饰和人工制品等），当然还有语言、音乐和文学等，程度不同地都受到文化相互作用的影响。”^⑦托玛丝·索威尔就敏锐地观察到：

有些人可能悲叹，非西方社会的丰富多彩的地方纺织品，被欧洲或者美国工厂大批量生产的布匹所完全代替。他们也许会惋惜，因为看到传统的饮品被成箱的苏打所替代，或者本土乐器搁置一旁，而人们用日本生产的便携式收音机收听美国的流行歌曲。那些哀叹这种事情的人们也正在哀叹文化融合过程本身，正是通过这样的融合，人类几千年来不断前进。^⑧

也有学者对“文化杂种化”论点提出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在欧洲和美国那些有大量移民的社会中，文化多元化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移民社

区正日益失去他们对原有语言和文化习惯的执着。另一些学者质疑移民社区已被同化的说法，认为这是不同文化的新形式的混合，也不可以把杂种文化视为全球化进程中空前的文化交融形势下出现的文化整合滞后现象。^⑨奎瑟佩·塞沃特罗就认为移民社会增加了西方社会文化和宗族差异性的说法证据不足。大多数美国全国性的调查仅“显示在一些公共价值观念，如民主、机会平等、社会流动、人权、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宗教多元和成年子女居住单人房间等上的变化，而不是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或互相冲突的生活方式”。美国的调查显示移民并不主动抗拒同化，而且，移民逐渐迁居出种族聚居区域，后代讲本民族语言的能力逐渐丧失，跨种族通婚增多，移民文化的延续仅是因为新移民的到来。^⑩

诚然，自人类有广泛的文化交往活动以来，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从来都不是平等的。“一般来讲，力量强大的国家具有文化资源优势，一方面它们对他文化的影响总是处于主动出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对他文化的主体具有难以抵制的吸引力”^⑪。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今天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文明或民族认同的许多认同不仅是“杂糅”的，它们还是前殖民化、抵抗和各种遭遇的产物，其中包括压迫、剥削和强制性改变信仰等。由欧洲殖民化制造的认同，如今被欢呼为是将欧洲同所有他者区分开来的欧洲认同的特点。如今被歌颂为中国文化的文化，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北方地区殖民化的产物。这一过程在中国西部一直持续到今天。伊斯兰教对世界一些地方的征服制造了一种伊斯兰认同，人们还在继续强烈保护着认同。奴隶制的可怕经历并未阻止非洲裔美国人与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美国印第安人的持续被殖民化，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扣留在集中营中的日本裔美国人也是这样。^⑫

当今世界可能最显见的文化传播现象就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美国化。挪威奥斯陆大学历史系吉尔·伦德斯塔德教授认为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就受到了“美国化”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1933年前）放映的电影中，60%到95%是美国拍摄的。美国的爵士乐和文学作品在欧洲变得相当普遍”。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限制这股“洪水”的进入，但最终收效甚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世界各地之人

受经济、技术和外来力量的推动，着迷于“快节奏的音乐、快速运行的计算机和快餐”，其他国家“正在被推进到一种同质的全球主题公园”，这就是被作者称之为的“麦当劳世界”，这个世界“靠着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麦当劳化”“迪斯尼化”以及“可口可乐化”等成为表明美国文化产品风靡全球的术语。1985年，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对亚洲14个国家29家主要报纸的“国际报道”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亚洲各国报纸“国际新闻”的主要提供者是西方信息源，其中美联社占了60%以上，而各报的“本报讯”总计只有21.2%^⑨。在影视方面，“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好莱坞影片的出口收入占美国该领域出口的比例，由1980年的30%增长至现在的50%”^⑩。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好莱坞的电影日益扩张，其在国内外电影市场的占有率，欧洲为70%，中南美洲为80%，日本占50%；而美国从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口电影的总和还不到3%^⑪。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正在借着把世界联系为一个越来越紧密的‘地球村’的全球化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整个世界蔓延”^⑫。

太过于夸大美国化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发现，就算到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与行为仍然保留有浓厚的中国味。你经常会看到几个中国家庭的大人们周末时会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或打麻将玩扑克，一如他们出国前在中国生活时的习惯。他们可能早餐和中餐是美国式的，但晚餐也经常是中国式的。研究“美国化”的专家之一荷兰蒂伯格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梅尔·埃尔特伦认为“在外国对美国文化接受上，相同的克里奥尔过程过去和今天依然处于争论中。那么我们可以讲一个双重的克里奥化”，即从美国移植过来的文化成分一旦脱离了美国当地的场景，它们就会改变形态，赋予新的含义。这样，当外国的“美国化”发生时，人们必须考虑文化之间的调解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对一种文化的机械式复制，而是“存在着有选择性借鉴和占用，转换和并入到当地文化的场景中。在欧洲对美国文化的接收上，杂文化和克里奥尔化的过程发生，就像美国以前屈从于来自欧洲的文化一样”。此外，埃尔特伦还强调欧洲文化对形成美国文化产品的影响，不赞成把“美国化”解释为现代化。美国化不是一种外来文化的“入侵”“殖民化”或“感染”

等，而是表明了“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系列交流”^⑬。

三、全球本土化

毫无疑问，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的文化景观，但文化并非出现简单的同质化现象。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言：

假使“文化”就是意味着一种集体的生活模式，或是一套信念、风格、价值与符号内容，那么，我们就只能言称“文化们”（cultures），而非“文化”（culture）；不论是集体的生活模式，或是一套信念……等等内容，都是以“一个世界里头的模式和内容中不同的模式和内容”为前提。因此，“全球文化”的观念在实务上是不可能存在的。^⑭

1992年，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在研究三洋公司全球商业策略后，提出“Glocalisation”（全球本土化）的概念。罗兰·罗伯逊观察到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全球同质化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⑮他发现，许多跨国企业（组织）考虑世界各地的特殊情况，将公司或旗下的商品或服务作适当调整，以符合当地文化和社会特性及需求，并藉以增加销售成果。比如，KFC是经济全球化的象征。但是在中国，KFC吸收了许多中国的本土文化元素，如他们提供米粥、油条和中国爱吃的辣鸡串。同样的，它到了日本就变成了日本食品。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迪斯尼乐园化也并非复制同样的消费风格，迪斯尼公司会吸收各地方部分文化符号重新设计。“全球本土化”的观念并不全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理念，日语叫做dochakuka（意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旨在用以加快日本流行商品在亚洲国家的占领速度。

弗雷德曼（J. Friedman）指出，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本土文化藉由不同文化策略手段运用同一机制，进而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最明显的是商品和市场。本土的传统思想必定会赋予一些所谓全球化事物本土理解。《好莱坞报道者》有篇关于电影翻拍大潮的文章认为，好莱坞的制造商越来越多地看到，与其从国外题材中一刀切出全球普适的热播片，倒不如获许翻拍美国电影外国版的收入来得更稳定。比如去年中国导演就翻拍了梅尔·吉布森的《偷听女人心》。^⑯

詹·尼德文·匹德斯认为，全球化应当理解为一个“杂交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国际混合物”。他指出：

它（全球化即同质化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些逆反的现象——即非西方的文化一直以来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它轻视了全球化的一些模棱两可之处，忽略了地方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例如，西方的因素是如何实现本国化的。它没能看到非西方的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它没有给文化交融留下空间——像世界音乐这样的“第三文化”的发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不但夸大了西方文化的同质性，而且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文化的族谱，就不难看出，无论是西方输出的标准，还是西方的文化工业本身，都带有文化混合的性质。^②

阿帕杜莱（Appadurai）则写道：“关于全球同质化蔓延的断言要么发展为美国化的论点，要么发展为商品化的论点，这两种论点经常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这些论点忽略掉的是至少和各种各样的大都市被拉入到新社会之中的速度一样快，他们倾向于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本土化：不仅在音乐和住房风格方面是这样的，在科学和恐怖主义，景观和宪法方面也是这样。”^③

据媒体报道，韩国流行音乐正以“全球本土化战略”涌入中国市场。如K-POP制造商一方面制作“本土化音乐”，另一方面利用网络和移动平台等“全球化工具”展开宣传。以造星公司SM娱乐旗下当红男团EXO为例，EXO组合内分为两个子组合EXO-M和EXO-K，分别侧重于中国市场和韩国本土发展。侧重于中国发展的EXO-M成员中包括4名中国成员（鹿晗、TAO、LAY、KRIS）。2014年6月7日EXO新发主打曲《上瘾》（Overdose），当天即占据Melon等韩国九大音乐网站排行榜榜首，新曲MV在YouTube点击量已破千万。EXO-M则在10日下午中国CCTV《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节目中夺得冠军。11日下午EXO还合体在上海举行了回归演唱会，共吸引1万名当地粉丝捧场。专家分析称，由于众多韩国偶像组合引进了中国成员，消除了语言和文化隔阂，因此能够与当地粉丝开展更亲密互动。预计今后更多的K-POP制造商将以此方式迅速进入中国音乐市场。

1997年，在一个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文化”

的会议上，罗兰·罗伯逊称全球本土化意味着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的融合，两者共同起着作用。

四、全球化与“超文化”

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曾以表演艺术为例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脉络。他指出，欧洲的音乐、舞蹈和戏剧在整个现代时期都遍及全世界，同时并没有支配或排斥别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也涌现出大量各种各样的别的表现体裁，如爵士乐、摇滚乐、雷盖——这些体裁都是因为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因为技术和爱好者的变化才产生出来的。日益激增的形形色色的媒体——电视、电报和卫星、光盘、无线电等等，进一步扩大了在全世界演示这些艺术的可能性，并且使来自任何文化的表演者都能够出现在全世界。^④

著名的文化研究者詹姆斯·鲁尔（James Lull）在《传播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超文化”概念。鲁尔指出：“超文化意指高于其他文化形态；与文化中的其他概念相较之下，拥有较高等级、质量与丰富度；且理所当然地超越以往的常规惯例限制与形塑了传统上思索文化议题的方式。此外，超媒体产制的象征内容包括了部分的超文化。”^⑤他认为，在超文化所包括的特性中，有的来自看似匿名的“超现代”世界，有的则来自通常所谓“后现代”世界中四散的文化碎片；但是这些超文化的成分亦包含一些更为持久且稳定的文化特性与传统。在另一本著作中，他写道，“超文化”（superculture）超越了传统的范畴，反映出两种主要的当前文化趋势：全球化与个人化。“超文化”是人们以有意义和愉悦的方式进行“抽取、评估、挪用和组合”，以便扩展其眼界、共享感受、创造社会网络、形成生活方式、并且组织生活“文化资源特定基质、非中介性日常情景、以及所有其他唾手可得的的文化再现与活动。”^⑥

鲁尔认为，他所说的超文化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谓的“超文本”密切相关。卡斯特在他关于“网络社会”的论述中，利用“超文本”这个词泛指再混杂的象征性产物，其产制也是透过各式“真实”的反思综合过程。卡斯特指出：“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make 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所有种类的信息都包藏于媒介之中，因此媒介变得十分全

面、多样、富于延展性，使得媒介在同一个多媒体文本里吸纳了所有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⑧

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著作中举了一个例子来分析他的超文本现象。1992年美国大选，当时的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想要为传统家庭价值辩护。挟其伦理信念，他与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引发了一场不寻常的辩论。墨菲是广受欢迎的电视肥皂剧里的主角，由优秀的女演员甘蒂丝·伯尔根（Candice Bergen）饰演，她表现（再现）了新女性的价值与问题：单身、专业的女性，对生活有自己的行事标准。总统竞选期间的那几周里，墨菲·布朗（而不是甘蒂丝·伯尔根）决定要怀个孕非婚生孩子，副总统奎尔急忙谴责她行为不当，引起全国哗然，职业妇女反应尤烈。墨菲·布朗（不只是甘蒂丝·伯尔根）回敬奎尔的则是：在下一集里，墨菲观看副总统批评她的那场电视访问，尖锐地批评政治家干涉女人的生活，并以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为她自己的权利辩护。最后，《墨菲·布朗》的收视率提高，而奎尔过时的保守主义则造成布什总统的竞选失败。这两件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有其社会相关性。1999年，奎尔又加入初选竞争，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奎尔的竞选以挑战开场，强调他依然健在，而墨菲·布朗已经从屏幕上消失了。但他徒劳无功：初选第一回合中他排名极低，因而退出了竞选。因此在对话过程中真实与想像构成了新文本。墨菲的想像世界未经请求便出现在真实的总统竞选中，引致将奎尔（或者是奎尔的“真实”电视影像）转变成墨菲想像世界中的一个角色，这时创造了一个超文本，在同一个论述里融合了来自两个不同层次之经验的炙热信息。这个例子里，虚拟（亦即墨菲在“实际上”跟许多女人一样，但却不是以任何女人的“名义”这么做）变成了真实，因为它和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政治选举过程真正有所互动，并产生重大的冲击。

卫星直播电视系统，尤其是互联网这样的传播新技术的发展，让原本区隔于不同文化场的人们，能够面对同样的文化场景。如全球数亿万的人们可以同时观看英国女王在位60周年大典，足球迷们能够在同一时间观看世界杯，而韩国的“江南 Style”也成为不同肤色人们模仿的对象。这些相似的经历，让人们更容易感觉到地球村的现实性。

当然“超文化”概念，主要用于解释文化脚本的混杂性与丰富性。比如说，美国好莱坞大片往往吸

收了原产于全球各种不同的文化符号系统的元素，它既包括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包括中国的功夫，日本的动画和卡拉OK，甚至还包含印度的宗教。这些超文化符号系统，成为全球化流行文化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除此之外，传播科技与文化形式的全球性混杂，与（通常是循环的）移民、外籍劳工、旅客、国际交换学生潮流共同发挥了作用，这些尤其强化了文化的不确定性与本体论上的不稳定性。

鲁尔说，随着人类文化运作范围的扩大，他们的文化经验也变得较不具地方性、比较没有那么全然的小区性。当人们透过“从各种文化领域中所产生、汲取的资源”与文化综合品相结合时，他们就会建构出自己的“超文化”。“超文化”是一种文化片段的融合，“此融合使自我和他人，在组成个体暂时性文化概貌上之认知模式、沟通互助与社会实体的组织性建构时，变的更容易理解。由于此种个人性的文化混血有助于文化认同的形成，然而这样的认同与忠诚却不必然是我们传统上会联想到的语言、血统与种族，这些永久不变的形式”。^⑨超文化感性同时与更加急迫的，通常是竞争性的、在地的、地区性的或是国家的文化渴望共存及相互作用。世界上新的部落制（tribalism）即再现了这些趋势：远离源于超文化形塑过程的折中主义。因此他建议：“最好将超文化视为在全球规模上运作的一种重要且普通趋势；也就是说，超文化反映文化全球化崭新方向的细微差异，而非在未经批判的情况下，彻底取代了对传统的集体理解与认同”。^⑩毕竟，文化活动在任何情况下皆非一种零和游戏，而是一个正在持续扩展的、动态的、刺激与影响的交互作用。

鲁尔进一步指出，“超文化”的元素并非独立于彼此之外。我们不会只从具自主性的物质符号领域中拣选汲取事物来建构自身文化的样貌。虽然“超文化”意味着一种深层的多文化性（multiculturality），却也反映出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ity），不同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以及“文化混血”。因此，“超文化”是一种动态的、跨脉络的、跨言说的、符号与报道的多重交谈。而社会行动者会将这些东西在其日常生活的梦想与剧本中加以评估或付诸实践。“超文化”是由广泛的资源混杂组成的，这些资源可以从深层的文明集体意识、国家与宗教，到较不熟悉的、其他文化的诱惑样貌。“超文化”彰显于自我理解、人类与探索等等功能性回路中；当人们从极为广泛可得

的事物中汲取资源并加以组合时，这些功能就能付诸实现。^⑤就像中国乡村随处可见的景观：村民们用传统的中医治病，但他们乐意接受西医的治疗；他们会在庙堂祭拜关公或者妈祖，但也会使用国际信用卡与计算机。

五、总结

在这个因为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村”里，在这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包围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世界的文化观到底会呈现出怎样的结果？这个世界是否正变得没有了差异或者正相反而更碎片化？许多当代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形象、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的全球传播，被多民族和通讯产业强化，事实上促成了象征性创造力，减少同质性，并增加文化多样性。霍尔（Hall）就认为全球化可能产生三个结果：1. 因为文化同质化，国族认同被消融；2. 国族或地方认同因为对全球化的抵制（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而得到增强；3. 尽管国族认同在衰退，但是新的认同将会形成。^⑥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D. 史密斯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我们提及“文化”，就意味着一种集体生活模式，或者全部信仰、风格、价值观和象征符号，那么，我们只能说多种文化，而非文化；因为一种集体生活模式，或者全部信仰等，在一个模式与全体事物的宇宙中，预示着不同的模式和全体。这样，一种“全球文化”的观点是不具有实际意义的。^⑦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用“梯子”和“马赛克”来对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预判。第一种是“梯子”，指的是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中的社会类型）能够在进化的时间上进行排列的观念，将社会在空间上的分布转译成时间性的进程。这就是霸权的人类学，首先是英国的霸权的古典进化论，接着是

美国的霸权的新进化论。第二种是“马赛克”，这指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图像，它是将时间重新置于空间中，将世界划分成很多边界并被界定得很清楚的单位的一种图像，这些单位都有同等价值，或者也许是不可比较的。乔纳森·弗里德曼指出：“民族志世界的被全球化了的想象是世界‘人群’的地图，是认识到了在更大的世界的任何点上都有着混合物，没有一种文化是纯粹的，所有文化都包含了来自更大体系（如果‘体系’是个正确的词的话）中其他地方的因素的一种意识”^⑧。不过，任何预测都会有风险，因为人类世界的变数太多、太复杂，人类的智力根本无法穷尽所有的变量。但有一点詹姆斯·罗尔的判断应该是对的，那就是他认为“全球化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复杂的和无可否认的后果就是象征性权力多样化、它的文化功用多样化和语境的复杂化。同样地，坚持认为传统文化应该像博物馆的坟墓一样保留，这种观点是不明智的，也不具有前瞻性。历史表明，文化——如跨国公司，也许像生物体和思想一样——必须生长，否则就会死亡”^⑨。

总之，人类对现代性追求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文化观。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甚至是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祖先重新回到他们当年生活的场所，他多少会有些无所适从，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如此之陌生。不过，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认真梳理，我们将会发现文化的影响“更是多样性的集合，而非一致性的复制”^⑩。因此，即使我们的祖先真的重回人间，他用不了多久便能适应，因为我们的“思维与生活的地方和地区性方式，在面对外来文化影响的时候，没有完全消失。当全球化不可逆转时，全球的东西没有破坏或者代替地方的东西”^⑪。文化本身的概念预示着差异。

注释：

- ① 参见王建陵：《杂糅与全球化文化生产：以迪斯尼动画为例》，《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4期。
- ② 赵冬梅：《美国精神笼罩下的动画片〈花木兰〉》，《电影文学》，2012年第17期。
- ③ Rushdie, S. 1991, *Imaginary Homelands*. London: Granta. p. 394.
- ④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 ⑤ 何平、陈国贵：《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若干概念简析——文化杂交！和杂交文化！概念的理论内涵》，《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 ⑥ Robert son Roland.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pp. 23 - 24.
- ⑦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 ⑧ 参见 [美]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黄胜强、许铭原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 ⑨ [美] 詹姆斯·鲁尔：《传播时代的文化》，邱进福、陈锦玉等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202 页。
- ⑩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4 页。
- ⑪ Hannerz, V. (1992) *Stockholm: doubly Creolizing*, in Daun, A., Ehn, B. and Klein, B. (eds),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Stockholm: Swedish Immigration Institute, p. 96.
- ⑫ 王晓德：《“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美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⑬ David Blake Wills, *Creole Times: Notes on Understanding Creolization for Transnational Japan - America*, in Takeshi Matsuda, ed., *The Age of Creolization in the Pacific*, pp. 4, 18.
- ⑭ Sowell, T. (1994). *Race and Culture: A World View*. New York: Basic Books, p. 226.
- ⑮ 参见何平、陈国贵：《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若干概念简析——“文化杂交”和“杂交文化”概念的理论内涵》，《山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
- ⑯ Giuseppe Scirotino, *From Homogeneity to Difference? Multiculturalism as a Description and as a Field for Claim-Mak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 6, cited in Kwok-bun Chan, *Inner Hybridity in the City: Toward a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2, 2003. p. 196.
- ⑰ 王晓德：《“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美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⑱ [美] 阿里夫·德里克：《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中国学术》，2003 年第 1 期。
- ⑲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 254 页。
- ⑳ 张步中：《新时期中国电影娱乐意识论》，《艺术百家》，2003 年第 1 期。
- ㉑ 沈本秋：《美国文化全球化的层次结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12 期。
- ㉒ 参见王晓德：《“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美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㉓ Melvan Elteren, (1996) *Conceptualizing the Impact of US Popular Culture Globall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 30, No. 1, Summer 1996, pp. 52, 61, 62, 65, 68 - 69. 转引自王晓德：《“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美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㉔ Smith, A. (1990).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p. 171.
- ㉕ Robertson, Roland.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p. 25 - 44.
- ㉖ 《电影制造商的“全球本土化”》，<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92465/336678>
- ㉗ [英] 约翰·斯道雷：《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对全球化等同于文化美国化观点的一些疑问》，罗玉琴译，载单波、石义彬主编：《跨文化传播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 - 30 页。
- ㉘ Appadurai, A. (1998)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32.
- ㉙ [英]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冯玲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31 页。
- ㉚㉛ [美] 詹姆斯·鲁尔：《传播时代的文化》，邱进福、陈锦玉等译，台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172 - 173、207 页。
- ㉜㉝ [美] 詹姆斯·鲁尔：《全球化下的传播与文化》，陈芸芸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12 年版，第 300 - 301、301 - 302、305 页。
- ㉞ [美]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51 页。
- ㉟ Hall, S. (1996) *Who needs identity?*, pp. 1 - 17 in S. Hall and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 ㊱ Smith, A. (1990).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p. 171.
- ㊲ [美] 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17 - 318 页。
- ㊳㊴ [美] 鲁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269、271 - 272 页。
- ㊵ Hannerz, Ulf (1990) *"Cosmopolitans and Locals in World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7, pp. 237 - 251.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国涛】